

权力的他者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他者的话语

权力的批判

现代性的第三条道路



曹卫东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513156

B089.1

C150



权力的他者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他者的话语

权力的批判

现代性的第三条道路



曹卫东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6513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的他者 / 曹卫东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3

ISBN 7-5320-9349-2

I. 权... II. 曹... III.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思想—研究 IV. 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17108号

权力的他者

曹卫东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通市先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202,000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本

ISBN 7-5320-9349-2/G·9187 定价:(软精)18.00元

序

这些年来养成了一个自以为不错的习惯，就是读书偶有所得，便记录下来，条件允许时，还整理成文。陆陆续续，就有了现在收集起来的这些文章，除个别篇章外，它们大多都在一些杂志或报纸上发表过，有些还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或批评。这里除了要向曾帮助发表拙文的报刊（《读书》《视界》《天涯》《中华读书报》等）表示感谢之外，还要向曾对拙文提出过批评性或指导性意见的师友致以敬意。以文会友，大概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情了，尽管有些批评听起来有点刺耳，但依然让我觉得难能可贵。事实上，也正是有了这些批评性或指导性的意见，我才觉得这些文章值得辑集出版。

文章虽然是辑集起来的，但内部还是有着一一定的互文性的，主要体现在它们的背景线索上，共有两条，一条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另一条则是德国思想史（以中德文化比较为取向）。前一条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用功的领域，虽然未能取得什么硕果，但还是有些心得的，特别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紧张关系的揭示，或许会有助于加深国内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解。后一条则是我今后打算研究的重点，按照规划，想撰写一部《德国现代思想史》，目前正在写作其第一卷（《十八世纪卷》），这里的一些文章就是在写作过程中的“边角料”，拾掇起来，留作纪念吧。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王为松先生和施宏俊先生，没有他们两位的鼎力帮助，这本虽有些“杂乱”，但还算“有章”的小册子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地出版发行。

曹卫东

2002年4月4日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GA2100/04

I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 3/ 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者
- 9/ 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
- 14/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 22/ 学术造反与制度紧张
——关于霍克海默与
哈贝马斯之间的冲突

目录

Mu Lu

- 33/ 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
- 4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其他
- 45/ 在权力与话语之间
- 51/ 哈贝马斯：出位之思
- 59/ 哈贝马斯的文化间性
——哈贝马斯中国之行记述
- 附录：哈贝马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答问
- 73/ 福柯、罗尔斯及其他
——哈贝马斯“读书座谈会”记录
- 81/ 后民族民主与欧洲的未来

II 权力的批判

他者的话语

93/ 卢梭是个保守主义者

104/ 赫尔德的 1769 之旅

117/ 论歌德的“中国主义”

132/ 走向一种对话理论

——由“交往理性”看比较文学

144/ 20 世纪德国的艺术意志

159/ 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

172/ 狡猾的刺猬

186/ 领袖与思想家

198/ 对“现代断裂论”的反拨

——布卢门贝格和他的

《现代的合法性》

204/ 别有选择

——吉登斯·反思现代性·其他

210/ 审美自然主义：哲学的第三条道路

232/ 中德现代化比较笔记

现代性的第三条道路

243/ 附录一：人名对照

255/ 附录二：书名对照

I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者

德国学者维格斯豪斯在其巨著《法兰克福学派史》中,把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现代学术制度的合法性归结为五个方面,即一个制度框架(社会研究所),一位卡里斯玛型的领袖(霍克海默),一部宣言(《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使命》),一个新的范式(“批判理论”),以及一份机关刊物(《社会研究杂志》和后来的《社会研究所论丛》)。

而在这当中,制度框架即社会研究所的建立,更加具有首要性和基础性。我们完全可以断言:离开社会研究所的制度保障,法兰克福学派的建立将如同虚设,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也将缺乏后劲。一部法兰克福学派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研究所的变迁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著作在对待社会研究所的历史方面,一般都只看重建所的日子(1924年)和霍克海默就任所长的奠基作用(1931年),而忽略了其他许许多多人为社会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史前史略加追溯和发掘,就可以获取一幅较为完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图景。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史前史,是指霍克海默正式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前的一段历史。需要挖掘的人物包括出资兴建社会研究所的魏尔家族(Hermann Weil, Felix Weil)、候任所长格拉赫、首任所长格吕恩堡等。



说到社会研究所的建立，首先应当着重提及的就是魏尔家族。然而，无论在社会研究所的历史档案里，还是在已有的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著作中，赫尔曼·魏尔以及他的儿子费力克斯·魏尔，作为该学派的奠基者的角色，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我们说魏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奠基者，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首先当然是指他们发起和资助了社会研究所，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再者则是指费力克斯·魏尔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和学术活动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当然成员。也就是说，他的学术活动以及学术成就应当归入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当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扬。

时至今日，关于魏尔家族的历史文献已经散失殆尽了。岁月悠悠，在人们的记忆当中，魏尔家族只留下一个有钱的形象而已，就像布莱希特曾经刻薄嘲弄他们的那样。其实，这样看待魏尔家族实在有失公允。

追溯起来，魏尔家族源自巴登(Baden)边上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世代经商，但一直都是小本生意，直到赫尔曼·魏尔这一代才有长足发展，并迅速崛起，成为巨商。赫尔曼·魏尔，1868年生，小学毕业后在当地的粮行里当学徒。20岁的时候只身一人前往阿根廷，开始他的谷物商生涯。当时的阿根廷，粮食根本不能自给，严重依赖进口，这就为倒买倒卖提供了机会。赫尔曼抓住并利用了这一商机，大加发挥，经营业绩倒也不凡。1898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主要经营小麦，兼营运输等。公司发展十分迅速，很快便成为一家跨国公司，赫尔曼本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赫尔曼为家族经济资本的积累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赫尔曼不但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商人，也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社会活动家。据载，赫尔曼回到德国后，利用他在海外的公司，有意识地收集和编写各国的经济信息、政治动向，定期提交给有关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赫尔曼成为了普鲁士政府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顾问。



然而,赫尔曼的杰出之处或许就在于,他没有陶醉和满足于自己的经济成就和政治地位。他像他的所有同胞一样,对于思想还别有一番关怀。他不但自己勤于思考,还时刻惦记着为德国学术事业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此,他想设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资助学术,弘扬思想。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赫尔曼的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得偿。

赫尔曼未遂的心愿,由他的儿子费力克斯帮助完成了。费力克斯·魏尔,1898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9岁时回到法兰克福上学,读书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主将的洛文塔尔。1916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学和社会学。后师从著名社会经济学家阿道尔夫·韦伯,1920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社会化:社会化计划的概念基础及其批判》。

完成学业后,费力克斯加盟了法兰克福左派知识分子团体,并资助他们定期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1922年,讨论被制度化,这就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参加讨论的有科尔施、卢卡奇、波洛克、蔡特金、索尔格、魏特夫以及费力克斯的至交聚斯金德等。由于费力克斯觉得换种讨论形式或许更好一些,因此,这种制度化的讨论没有坚持下去。后来,费力克斯在父亲的支持下,提出了建立社会研究所的设想,要求研究所致力于探讨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反犹太主义的起源,并希望研究所能独立于大学和政府行政机关之外。

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为了配合研究所的工作,费力克斯还资助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同苏联科学院合作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资助者,费力克斯本身虽然也是一位学者,但他明确宣布不介入社会研究所的任何事务,不管是行政的,还是学术的,而只是一直默默地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这点实在难能可贵。

1931年,迫于时局的压力,费力克斯回到了阿根廷,并全力帮助德国的流亡人士。1936年,费力克斯又被迫移居美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国。在听到好友聚斯金德被斯大林杀害的消息后，他极度失望，从此与一切左翼理论和组织分道扬镳，过着清静无为的生活。1963年，为了庆贺费力克斯65岁生日，法兰克福市授予他荣誉勋章和社会研究所荣誉成员的称号。1969年到1973年，费力克斯曾短暂回国。1975年，死于美国多佛（Dover）。

费力克斯在成立社会研究所的设想刚刚成形后，便着手物色合适的领导人选。通过父亲的关系，他结识了科隆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格拉赫，并把他锁定为最佳人选。

格拉赫，1886年生于汉诺威，1905年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1907年转入基尔大学攻读化学和哲学，1910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丹麦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913年，格拉赫在莱比锡完成并通过了教授资格论文《女工保护的意义》，随后到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担任助教。1920年，到亚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

格拉赫的思想非常左倾，对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的研究，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过从甚密，考茨基和索尔格等都是他的好友。正是这种左倾的立场，让他和费力克斯走到了一起。1922年，格拉赫应聘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协助费力克斯一道创办社会研究所。经过艰苦的工作，费力克斯和格拉赫终于把社会研究所的一切前期工作准备就绪。据载，他们在申请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如何才能既让研究所依附于一所大学，又让研究所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且还不允许官僚机构插手。

1923年初，普鲁士政府正式批准成立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并明确规定这是一个教学和科研机构。同年3月，研究所大楼破土动工。然而，就在此前不久，格拉赫，这位被费力克斯认为是“年轻有为、训练有素而且出身高贵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因病英年早逝，未能亲眼看到研究所奠基的场面。

格拉赫去世后，费力克斯开始同其他学者接触，继续为社会研究所物色所长。最后，他在柏林社会民主主义者迈尔和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吕恩堡中间选择了后者。

格吕恩堡,1861年生于罗马尼亚,1881年开始跟随斯坦因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1892年改信天主教,1894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并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讨论波西米亚等地农民解放与农村生产关系改革问题。1899年获得教授职位。1910年创办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

格吕恩堡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学生都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骨干,包括阿德勒、莱纳、希法亭和鲍威尔等。1919年,他在维也纳建立了社会研究所,并任命考茨基为所长。可惜,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过于软弱,让格吕恩堡看不到丝毫的希望。因此,在接到费力克斯的邀请后,他立刻应允出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一职。

格吕恩堡在任期间,主张包容性的研究方略,聘用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这当中就有魏特夫、索尔格、格罗斯曼以及波洛克等。研究所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同苏联合作出版马恩全集上面,并继续出版“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

然而,就在格吕恩堡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1928年1月,疾病袭击了他,中风让他卧床不起,直到1940年去世。病榻上的格吕恩堡大仁大义,主动提出放弃领导职位,让费力克斯另寻高明。在波洛克的推荐和帮助下,霍克海默来到了法兰克福大学,出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并被任命为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从此,社会研究所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有人不无残忍地形容说格吕恩堡病倒得恰是时候。因为如果没有他的病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恐怕还轮不到霍克海默出面替社会研究所收拾残局,寻求出路。看来,究竟是时势造就英雄,还是英雄成就时势,实在难以言说。

1999年9月,法兰克福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纪念社会研究所成立75周年。《法兰克福大学学报》也推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集,封面上赫然印着社会研究所的9位骨干,分别是费力克斯·魏尔、格吕恩堡、波洛克、马尔库塞、霍克海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权力的他者

默、阿道尔诺、洛文塔尔、哈贝马斯以及福利德堡。这当中,虽然少了格拉赫,但费力克斯·魏尔和格吕恩堡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奠基者的角色毕竟得到了承认和尊重。





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

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自开创至今,已历三代,据说,第四代亦已崭露头角,如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的佛斯特和政治学系的尼森,就深得哈贝马斯的赏识,但他们终究还未成大器,说他们自立一代,恐怕还为时过早。

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代都有一个核心人物:第一代我们都知道,是霍克海默,他用他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为法兰克福学派奠定了经验研究和社会批判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第二代是哈贝马斯,他总是嫌他的老师经验性太重,规范性欠缺,老是要来一个“拨乱反正”,用他的《认识与兴趣》为批判理论奠定一个规范的研究框架。第三代是现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的霍耐特,他在最近的一篇纲领性文章《关于社会研究所的未来》中试图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一直都被命名为“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以此强调其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那么,何谓批判呢?学界一直没有形成定论,就连法兰克福学派自身内部也有着不同甚至相对的理解。不过,粗略地说,大概跑不出这样三个层面:思想层面,指的是理性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社会层面,强调的是社会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最后是国家层面,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政党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当然,这三个层面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照应,构成



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我们又可以这样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实际上还是在卢卡奇的思想里打转转,强调的仍然是一个总体性。

在总体性批判概念的指引下,法兰克福学派经历了三代70多年的发展,实属不易。可是,到了法兰克福大学之后,我才知道,所谓三代,在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含义是有些差别的。也就是说,某些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导师并不是其制度的掌门人,制度的掌门人也不是学派的理论舵手。这一错位现象发生在第二代那里,因为,第二代的理论导师是哈贝马斯,而制度掌门人却一直都是他的师兄弟福利德堡。两个人一个具有叛逆性,以强调规范性研究而不被霍克海默他们容忍;一个则是中规中矩,坚决贯彻导师的意志。

我们这里不想从理论上,而想从制度上来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掌门人。在制度上,第一代的掌门人也是霍克海默,这点没有问题。对霍克海默,我们已有相当的了解,这里就不再赘述。第二代是福利德堡。对于中国学术界,福利德堡是何许人也,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福利德堡生于1924年,和社会研究所同龄。1951年,到法兰克福大学实习,认识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从此,与社会研究所结下了终生之缘。大学毕业后,在社会研究所担任助教。1960年,跟着阿道尔诺获得教授资格,1962~1966年,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6年,返回法兰克福大学成为社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1969年,出任黑森州的文化部长。1975年,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并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2001年3月28日退休。

作为社会学家,福利德堡以经验研究见长,长期致力于产业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研究民主文化和社会福利国家制度问题。此外,福利德堡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急先锋,在担任黑森州文化部长期间,努力打通教育与社会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为德国“后1968教育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福利德堡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和哈贝马斯等合作的)《大学生与政治》(1961)、《产业社会学》(1963)、《德国的教育改革》(1992)以及《教育:在启蒙与适应之间》(1994)等。

1999年春天,我拿着霍耐特教授的推荐信,到福利德堡教授的办公室去拜访他。办公室以前是阿道尔诺的,位于社会研究所的一楼靠近马路的角上,里外两间,相当阔气。此时,老先生已逾古稀,虽然清瘦,但精神矍铄,每天都坚持上班,当时正在全力筹划社会研究所的75岁华诞。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介绍了社会研究所与汉语世界在历史上的接触情况。当我告诉他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学术界非常热门时,老先生显得有些兴奋。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在不同场合还有过几次见面。但就在那年的夏天,社会研究所发生了“地震”。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就是福利德堡一直都很信赖的助手杜比尔对他进行了攻击,认为他长期坚持经验研究,对当代学术动向缺乏起码的了解,把社会研究所带进了死胡同。记得杜比尔对新闻媒体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社会研究所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端坐在船长室的人压根就不知道航向,这艘船要是不沉才怪呢!”

于是,杜比尔在研究所内外发动了一些人起来反对福利德堡的“权威领导”,要求福利德堡交出权力,由他自己来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但姜还是老的辣,这场冲突最后以杜比尔被迫离开社会研究所而告终。对于杜比尔的这次“造反”,有人说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在福利德堡当政期间,他一直都是一个大红人,所里的主要规章制度以及管理方式也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换言之,如果说福利德堡真的是一个“权威领导者”的话,那也是由杜比尔自己精心塑造起来的。

事态渐渐平息了,可社会研究所内部的矛盾也彻底暴露了。一时间,德国许多媒体借机造势,纷纷对社会研究所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判意见,有些还把矛头对准了福利德堡教授。比如,有媒体就拿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表兄弟”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

